

陶行知与体育

本院体育学研究室

胡小明

提要: 陶行知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可分三个阶段。他在第一阶段所研究的体育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对体育的认识也较为科学,为我国二十年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陶行知第二阶段的体育思想受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最大。第三阶段他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并加以实践,从而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

研究陶行知的体育思想,对更快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现在虽有数以百计的文章,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其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体育思想,却鲜有专文论及。多年来由于缺乏研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没有为陶行知的体育思想及其实践留下应有的一页,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陶行知自幼不仅聪明好学,而且生性活泼,少年时经常与同伴们在歙县谯楼(又名二十四根柱,现为歙县博物馆)附近踢球游戏。^①所踢之球为实心小皮球。据曾和陶行知一起踢过球的人回忆,陶常对同学们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身体魄。”^②足证他从小就重视体育活动。

1910年,陶行知由汇文书院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他在学校里是一位热心于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主张不读死书、不死读书,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入学第三年,他任学生办的一份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同时大力宣传救国运动,举办运动会、演讲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卖门票的办法来募集救国捐款。1912年(民国元年)5月24日,他积极参加邀请苏州东吴大学的学生来南京联合举办运动会,以售票所得作为“爱国捐”,帮助解决辛亥革命著名人物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机关的财政困难。在运动会期间,他还热心组织金陵大学的同学到运动场共同维持秩序。^③1913年4月他在《金陵光》第4卷第3期上发表《一夫多妻之恶果》一文,认为多婚“戕身贼体,流毒子孙,人民无体育也,而社会有萎靡之习”。^④尔后,又发表《惠罗先生激励支哥大学体育会诸君》,提出“三育并重”的主张,谓“有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饥,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⑤他还积极组织学生们支持和赞助校内的运动会。

陶行知1914年去美国留学后,更感体育健身的重要。他在第二年夏天写信回家,自谓身体又强壮了许多,希望母亲每日下午偕妻、妹“到上山游游。上山空气清洁、益肺、通血

脉，常游必壮”^⑥，热爱生活之情，跃然纸上。

1917，陶行知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他早期的体育思想，寓于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之中，与他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论有一定联系。“五四”运动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形成，体育思想也逐步成熟，并对旧中国的体育事业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四”运动当年，他作为南京高师的教务主任，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游行集会，其后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提倡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发挥自觉性，提出“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主张。^⑦联系实际，他认为体育课应因材施教，“拳术一课，关系个人之体质及兴味”，所以在教务会议上提议除体育专修科外，其他学科应将拳术改为选修，这样，“则教者能活用方法，为个别之教练；学者应其所好，自易收效”。^⑧从中可窥见“生活教育”的影子。

他在首次提出“生活教育”概念的《活的教育》一文中说：“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更要紧的。……我们总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都是很健全的、愉快的。”^⑨表明了他的全面发展的正确观点。

1921年底，美国教育学家孟禄来华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在北京与中国教育界人士进行了讨论，陶行知参与整理的会议记录中反映了他自己的观点：“师范学校现在提倡游戏运动及徒手体操，是个好现象。那个兵式的机械的体操，应该免去。”^⑩因为受军国民主义影响的兵操是死的，而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体育活动应该是活的。

由于一件不幸事故的发生，促使陶行知做出了一个在他一生中最值得载入体育史册的举动——发起并筹组“中华杏秀游泳社”。

那是1921年11月21日，陶行知一行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任孟禄博士前往苏州调查教育情况，江苏第二女师附小一年级主任毛杏秀行车过桥时翻落入水，沉没不起，同行十余人“平时都能够作文章演说，至此除搓手顿足之外竟一无所措”，眼睁睁看着她淹死。陶行知“所以于痛惜毛女士之余，发起这个游泳社，提倡游泳运动”。他认为学游泳一方面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在事变时还可救他人生命。而且，“即他日再参与远东运动会，于游泳一项亦可多一夺得锦标之机会。”他在一个月以后撰写的《中华杏秀游泳社之缘起与简章》一文中还说：“本社以促进国人游泳技能之培养为宗旨。本社社务如下：甲、提倡游泳技能之操练并普及游泳应用之知识；乙、承受私人公共教育机关对于游泳组织计划之委托；丙、分地创设模范游泳池。”^⑪

直到第二年夏天，陶行知在安庆暑假演讲会上以《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为题作演讲时，还提到这件事，并联系到学校体育说：“学校讲求体育，该问此种体育是否增加学生的体健，使他们不致有种种不测之事发生？”^⑫

这件事情也不能不引起他注意到周围同事们的健康。1922年陶行知以《办公原则》为题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的办公条件差，“故近视有之，驼背者有之，病肺者有之，患脑者有之。……为办公人员稍置体育设备，亦促进体育之一端。”^⑬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既反对传统教育，又反对洋化教育，他与蔡元培人于1921年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收回教育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来，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主权的呼声日高。1924年第三届旧“全运会”之后，当年7月

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由此而取代了受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外国人控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⑭可惜的是，对在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报告了社务并连任总干事的陶行知，我们除了知道他提到“本年又有两种重要会议：（一）全国体育；（二）童子军教育”^⑮外，尚未找到他与“全国体协”成立有关的更具体的材料。

在南京高师及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期间，陶行知与一些热心体育的教育家有密切联系。例如，他在学校曾与积极倡导体育的革命教育家杨贤江合影，^⑯后来又让杨贤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编辑组工作。^⑰最值得提出的，是他与美国著名体育家麦克乐的联系。

麦克乐（1886～1959），1913年来华传播西洋体育，1916年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1920年后回国，第二年再度来华时，南京高师已改名为东南大学，他继续任体育系主任。他于1922年和1923年连任两届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及国民游戏组”负责人，并于1924年建议将该组与卫生组合并，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卫生组”。^⑱作为东南大学教授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对麦克乐卓有成效的体育工作十分赞赏，他在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而写的英文论著《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说：“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赞助下，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研究。”^⑲这表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虽然反对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洋化教育，却并非是反对汲取外来的科学知识。

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陶行知辞去大学的职务，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全力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开展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这一阶段他对体育的认识不再停留于理论，而转向实践，面向广大的民众。他认为，生活教育应以改造社会为目的，要通过普及教育，使国富民强，人民生活提高，安居乐业，尤其主张训练农民使生产力和武力合而为一。因此，这时期他对武术表现出较大的关注。譬如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的报告中，陶行知提出在他创办的“晓庄师范”里建立“乡民武术会”，晓庄附近的十二个乡村里的农人倘欲受武术训练，都可由师范学校武术指导员教以相当之武术。”^⑳1932年5月，他在《申报》“自由谈”专栏连续发表文笔生动的《古庙敲钟录》，以文艺体裁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其中有大段关于武术教学的形象描绘。此时正值国难当头，他本人又因献身于民主革命事业而曾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对能强身自卫的武术感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

陶行知1927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是试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基地。创办时没有体育设备，便聘请了原东南大学于振铎、韩凌森两位武术教师，每天早晨五时半至六时半上“拳术”课。根据各人体质和兴趣，分别学习刀、枪、棍、棒。学生们对习武的兴趣很浓，并自己动手平整操场。他们还组织附近乡民修建联村运动场，供村民们练习武艺及游戏运动之用。为此，成立了农民武术会。一位学生曾撰文介绍其办公宗旨为：

1. 增进农民的健康。
2. 联络农民感情。
3. 增加农民自卫力。

晓庄还经常举办运动会，促进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该校的校刊上也曾有介绍：“最近晓庄开个乡村运动会，凡晓庄农友和各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小朋友，以及本校同志，均是正式运动员，运动会中的各项节目与平常学校有所不同。成人如国技，

跑山，挑柴，挑粪，举石担，玩石锁，田径赛等，小朋友除团体表演外，个人竞赛如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三十米赛跑五项运动。……

我们开这乡村运动，目的一，我们运用乡村社会固有的运动，特具的风味，二，使农民得以参加团体活动的机会，并训练他们对于组织有纪律等事，三，联络情感，进而达到合作的地步，所以我很希望本校于今岁秋季举行第二次乡村运动会，更希望热心教育提倡运动的各机关和各学校，先后的举行民众化的运动会，来发扬国民固有的尚武精神，使中国达到自由平等的地步。”②

联村运动会由陶行知主持，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偕同吴稚晖等到会。陶行知与杨杏佛、吴稚晖一同参加跑山竞赛。陶行知为运动会创作一种蓑衣舞，在三千人的会场中表演，由男女同学二十余人各披蓑衣，荡漾于大自然中，别有风趣，飘逸如仙，使人发生快感。这样浸润着生活教育精神的运动会，与当时旧中国所办的各式各样的运动会是大相径庭的。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于1935年在上海举行后，陶行知出于对国民党政府借办运动会粉饰太平的愤怒，撰文发表声讨：“为了运动会，什么都忘了，东四省忘了，华北忘了，黄河水灾忘了，长江水灾忘了，两层水灾夹着的旱灾忘了。总而言之，整个国难都忘了。”他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东北各省选手出阵的时候，每队前面是张着一面大旗，旗上画着亡省的地图，地图四周画以引人注意的黑边，全场看众在热烈的欢迎中是滴了热烈的眼泪！……流了眼泪之后怎样呢？依旧是：跑的跑、跳的跳、说的说、笑的笑！”陶行知紧接着又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伪善之举：“所说的普及人民体育，想来这人民总是包括穷光蛋和穷孩子吧。不知道哪一位体育大官大发慈悲，发出一个广告，说是穷苦的人看运动会可以免费，后来一打听，知道只以五百人为限。在一百万人当中穷苦人居然得到五百个位次，数目虽少，总算没有一概抹煞。……上海的穷苦人尚且是这样，那些水灾、旱灾地带吃树皮草根的老百姓，更是连盐影和运动影都没有看了，还说什么体育普及？”他还对参加比赛的选手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③而同一时期他在《萧场工学团一周年纪念联合运动会歌》中说：

“一二三，	把帝国主义打退。	打的是拳头；
三二一		放的是风筝，
但愿个个身体好，	‘三不象的运动会，	砍的是斧头；
不愿拼命抢第一。	找不一个选手。’	挑的是粪桶，
(一)	你说得很对，	舞的是锄头；
大家来运动，	我们不做跑狗，	玩的是石担，
大家来运动。	不做蟋蟀，	攀的是山头。
放下你的重担，	不做斗牛！	锻炼好身手，
别说你没空。	我们都是选手，	要叫被压迫的一齐来出头。
(二)	都不是选手。	一齐来出头，
来开运动会！	有人送礼来，	人的脚底下不再有人头。”④
来开运动会！	也愿拍拍球。	
练好你的身体，	踢的是毽子，	

充分表明了他自己所提倡的运动会精神。与此同时,陶行知、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知名人士联署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在《生活教育》上撰文支持“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坚定地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行知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而奔波,宣传抗战,并推行战时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他于1939年7月20日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著名的育才学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体育思想融入到“健康教育”之中。

在敌后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接受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经济十分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以解决育才学校立案和经费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向育才学校派出培训主任,遭到陶行知的严辞拒绝。他曾诙谐地说:“我成了个体育家,练习田径赛和米赛跑!”以表示对飞涨的米价不满。^{②4}在这样艰苦环境中,无法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连维持身体的基本健康也是很难的。

因此,陶行知把学校师生们的健康放在了首位。他说:“首先,我们每天应该要问的,是‘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健康第一’。”^{②5}他将运动游戏作为教育活动的单独部分,并将体育与卫生紧密结合起来,订立了《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强调应“适当的运动”。^{②6}

不过,他对某些实用性很强的项目还是很提倡的,譬如规定学生要“会游泳——包括仰游、俯游等。(在夏令必须参加游泳学习,在平时可定期去温泉学习。)”^{②7}育才学校里有体育课,提倡掷手榴弹、攀绳索、爬竹竿、跳绳、跳高、跳远、游泳等运动项目,经常开展一些小型竞赛,还积极组织集体游戏。孩子们在树上架秋千,自己做毽子,到附近的温泉去学游泳,一切都因陋就简。陶行知曾为小朋友们作《双手万能歌》,说:“玩秋千,翻觔斗,……和弟弟比球,数一数你的快乐,哪一样不是靠这双手?如果你也想去打倒帝国主义,还须拿出你的小拳头。”^{②8}

是的,陶行知此时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战士,就是要为人民的解放培养生力军,他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声疾呼:“这身体不属自己,我们的生活是为整个民族乃至新人类所有,我们要以卫生教育与环境卫生代替十分的医生,造成健康的堡垒,使得一点一滴的生活力与创造力都不致浪费。尤其是每一个人自己要爱惜他的身体。这身体要留着、锻炼着,与民族和新人类的敌人拼。”^{②9}

关于陶行知的体育的思想以及与生活教育理论的联系,尚待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仅从上面简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大致可分三个阶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早期有较多有关的体育内容,生活教育理论的形式对体育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在第一阶段所研究的体育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对体育的认识也较为科学,为我国二十年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陶行知第二阶段的体育思想受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最大,三十年代初,由于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他的思想发展很快,条件限制使其不能在农村开展近代西方体育,在实践中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把普及体育纳入到普及教育的活动之中。“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艰苦条件下,于第三阶段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并加以实践,从而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

应当指出,陶行知的健康教育观,是伴随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早在1923年9月20日他在致程仲沂的信中说:“知行以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①1926年11月21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上演讲时又说:“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②后来他还多次用学习游泳为例来阐明生活教育原理,表明了他的科学体育观、民族体育观、普及教育思想、健康教育思想。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支持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对他的体育实践也很关心。譬如,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搞一搞。”^③1940年9月25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专程到离重庆市区较远的育才学校作形势报告,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为真理而斗争,为新中国的远大前途斗争。周恩来看到育才师生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教学,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便送给陶行知一件用延安毛线编的毛衣,还派人送去400元,用以购买运动器具,为同学们锻炼身体提供一点物质条件。

陶行知为此写了一封要肖生开收据致谢的信:“肖生同志: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育才之后,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有欠,特捐助肆佰元为小孩子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敬祝,康健!行知。二九、十、十一”(日期为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

陶行知先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遭受反动派的迫害,体质恶化,不幸于1946年7月25日猝然病逝。时年仅55岁。陶行知的死,激起了千百万人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体育的重要性。诚如周恩来同志在陶行知逝世当日撰写的《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一文中所说:“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着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④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我们的体育事业发展很快,从“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亚洲“体育强国”,成绩斐然。对此,陶先生当含笑九泉。然而,相对丰富的体育实践而言,我们的体育理论是异常贫乏的。建国初期从苏联搬来的那一点点体育理论,很少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尤其是在各级学校里,教材几十年一贯制,教法陈旧死板,学生的健康状况改善不大,而诸如近视患者等却在不断增多。因而,我们研究陶行知的体育科学化的思想、发展民族体育的思想以及“健康第一”的思想,对更快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注 释:

①②③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第7、14、68、64~6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②《陶行知一生》,第3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③《陶行知年谱》,第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0、142、185、235、246~248、259、273、

← 463、403、65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⑤《陶行知年谱稿》,第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⑥《陶行知全集》，第五卷，第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⑦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第1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⑧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第93页载：“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该社于七月三日举行的年会，一月后是否又举行过会议？待考。

⑨杨志康：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麦克乐，《成都体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⑩该文曾收入美国出版的《世界教育年鉴》，译文见《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538页。

⑪⑫《陶行知全集》，第213、6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⑬《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37~555，881~88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⑭⑮《乡教丛讯》，第一卷第十三、十四期，第二卷第八期，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1927、1928年。

⑯《行知诗歌集》，第1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⑰⑱《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35、5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⑲⑳《陶行知教育文选》，第284、29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㉑《行知书信集》，第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㉒㉓《周恩来选集》，第333页、23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989年6月收稿)

简 讯

1989年8月中国遗传学会，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会联合举办的皮纹学第三届学术交流会在佳木斯召开，我院有三篇论文收入大会论文汇编并都在交流会上进行了宣读，引起了参加会议的遗传学界、医学界数百名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一致认为，皮纹学在体育上的应用为皮纹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谢燕群同志的论文《指脊纹数与运动能力关系的研究》和李红同志的论文《体院学生皮纹的TPD和atd角的初步研究》在交流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叶培基教授的论文《皮纹学与运动员选材》在大会上宣读，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